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三 編

林 慶 彰 主 編

第 3 冊

荀子社會思想研究

袁 信 愛 著

從解蔽心看荀子的知識論與方法學

潘 小 慧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荀子社會思想研究 袁信愛 著／從解蔽心看荀子的知識論與方法學 潘小慧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2+136 面／目 2+7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編：第3冊)

ISBN：978-986-6528-73-6 (精裝)

1. (周)荀況 2. 荀子 3. 研究考訂 4. 學術思想

121.27

98001636

ISBN - 978-986-6528-73-6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編 第三冊

ISBN：978-986-6528-73-6

荀子社會思想研究 從解蔽心看荀子的知識論與方法學

作者 袁信愛／潘小慧

主編 林慶彰

總編輯 杜潔祥

出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版 2008年9月

定價 三編 28冊 (精裝) 新台幣 46,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荀子社會思想研究

袁信愛 著

作者簡介

袁信愛，一九五九年生於台北市，四川省南川縣人。一九九四年畢業於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現任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哲學的研究與教學，並有數十篇相關論文的發表。目前專攻中國人學與中國古典生死學的探究，著有《人學省思》（文史哲出版）與《中國哲學史》（文津出版），另有「海歆工作室－袁信愛的人學天地」（<http://http://hk.geocities.com/ai1927>）之教學網站的設置。

提 要

本論文共分五章，共計十餘萬字：第一章「緒論」，係對荀子其人其學作一概括性的介紹。第二章「荀子的社會思想本論」，係對荀子的社會思想作一具體的說明和完整的闡釋。第三章「荀子的社會思想之哲學基礎」，係對荀子的社會思想所依據與發揮的哲學理論作一整體性的論析。第四章「荀子的社會思想之反省與評議」，係對荀子的社會思想之兩個重要課題作一析論與反省，並試圖就歷來學者對荀子之較為持平的論議，以期為荀子尋得一個公允，合宜的歷史定位與價值評定。第五章「結論」，係對荀子的社會思想之論作一審視，並點出當代學者可就不同研究視域而從《荀子》乙書中獲得啟迪。

本文的目的即在結構化與系統化荀子的社會思想，期藉「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四個次結構的論析，以透顯荀子之社會思想的主軸在其「禮義之統」的意識型態之確立與落實。而此意識型態的形構又有其「天道觀、致知論、倫理學、論理學」的哲學基礎。故本文的研究路徑係分別依結構的鋪陳與功能的論析，以進探荀子社會思想的具體方案；依意識型態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關係，以進探荀子社會思想的哲學理據。從而展現荀子對於人世的關懷，對於人文的重視，及對於人生的肯定。



目 次

前 言	1
第一章 緒 論	3
第一節 荀子的生平事蹟	3
第二節 荀子的時代背景	6
第三節 荀子的思想傳承	12
第四節 荀子的著述與傳經	26
第二章 荀子的社會思想本論	29
第一節 社會觀	33
第二節 政治觀	45
第三節 經濟觀	58
第四節 教育觀	67
第三章 荀子的社會思想之哲學基礎	77
第一節 天生人成——天道觀	79
第二節 解蔽知道——致知論	82
第三節 化性起偽——倫理學	86
第四節 正名止辯——論理學	91
第四章 學子的社會思想之反省與評議	99
第一節 制約與自由	103
第二節 專制與民主	110
第三節 歷史學者對荀子學說的評議	119
第五章 結 論	125
參考書目及論文	129

前 言

荀子是我國歷史上受人誤解最深，引人爭議最多的一位大思想家。然而荀子對於我中國文化之型塑的影響，卻也是不容後世學者所漠視的。

本論文共分五章，總計十餘萬字：第一章「緒論」，係對荀子其人其學作一概括性的介紹。第二章「荀子的社會思想本論」，係對荀子的社會思想作一具體的說明和完整的闡釋。第三章「荀子的社會思想之哲學基礎」，係對荀子社會思想所依據與發揮的哲學理論作一整體性的論析。第四章「荀子的社會思想之反省與評議」，係對荀子的社會思想的兩個重要課題作一解析與反省，並試圖就歷來學者對荀子之較為持平的論議加以探討，以期為荀子尋得一個公允、合宜的歷史定位與價值評定。第五章「結論」，係對荀子社會思想之論作一審視，並點出當代學者可就不同研究視域而從《荀子》乙書中獲得啓迪。

本文的目的主要在於將荀子的社會思想結構化與系統化，期藉「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四個次結構的論析，透顯荀子社會思想的主軸在其「禮義之統」的意識形態之確立與落實，而此意識形態的形構又有其「天道觀、致知論、倫理學、論理學」的哲學基礎。故本文的研究路徑分別依結構的鋪陳與功能的論析，以進探荀子社會思想的具體方案；依意識形態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關係，以進探荀子社會思想的哲學理據。從而展現荀子對於人世的關懷，對於人文的重視，及對於人生的肯定。

人不是完美的，人有其自然本性上的弱點；但人也是有智慧的，可以化阻力為助力，而為人世的共同存在謀得更美好的生活福祉，更完善的道德倫理。只要人能體認其自身所應負的存在職責，訴諸理智思慮地為人類的整體幸福而努力，人是可以依憑其自身之力來達到人世之正理平治的理想善境。

這是荀子社會思想的基本信念，也是荀子對人文治世的終極期許。

筆者不敢自稱已還諸荀子社會思想的本貌，但筆者確實努力地期由現代學術理論的角度，去重新審視荀子學說的點滴論析，企圖從中釐清並重建荀子社會思想的整體觀照與理論體系。故筆者寫作本文的基本心態及主要用意，是要藉對荀子社會思想的詮釋，進而作一反省與評議，以便陳示荀子社會思想的內在侷限與外在困境。

筆者不敢奢望本論文能激起世人對當前民主政治的失制、社會結構的脫序、道德規範的淪喪之現實景況，作一整體性的深省，但仍期望能藉此以警示世人對當前的意識形態作一重估，瞭解欲求現實的歸治、理想的落實，重點不僅在「分析問題」，而尤應重「解決問題」。

荀子所提出的具體解決方案，固然有其時空背景上的制限，不能全然符應當前「政治—社會」的實際需要，然本其師法孔子的「因革損益」之建制理念，秉承其「隆禮義而殺詩書」的義理統貫之人文信念，我人仍可超越其具體解決方案，而把握其透過經驗歸納與理智推度而得的治世共理—禮義之統，從而提綱挈領地規劃出符應現實需要，又能落實人文理想的具體解決方案。這是筆者對荀子之社會思想的一點點研究心得，也是筆者研究荀子社會思想的寫作動機。

很感謝項退結教授的開放式指導，使筆者得能自由發揮對荀子之社會思想的研究心得，因此若有論析失當之處，文責由筆者自負。尚祈前輩先進不吝雅正！

最後，筆者也要感謝家父母和張振東院長對筆者在生活與工作上所付出的關愛與體恤，以及諸位師長和親友所給予筆者的支持與鼓勵，使筆者得以順利的完成本篇論文的寫作，謹此一併致謝！

第一章 緒論

我國制度化的政治型態確立於西周之時；透過「封建—宗法」的同體複構之建制，結合「政治—宗族」之雙重約制力量的規範，訴諸禮文儀節之同化，而成就西周初年的平治之世。及至西周末年，王室東遷，王權旁落，遂轉入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爭霸，群雄逐鹿，「政治—社會」乃由治而亂。相應於傳統規範失控而起的自由時風，激發了新興的知識階層對「政治—社會」之亂象因由的理性反省，以致在社會上，是有諸子百家，競議爭鳴之勢；在政治上，則由封建貴族之政治型態漸入君主專制之治。而荀子即是出現在此轉型之際，彙整先秦諸子之議，而另闢新境的一代大儒。

蓋因受時勢影響所致，荀子立論遂以「政治——社會」之平治，為其主要訴求之視域，而重人文建制之效，論禮法兼制之要，以「政治——社會」之正理平治，為其設備之終極要旨。故本文即欲就其社會思想之角度，觀其相關（社會、政治、經濟、教育）之陳議與其哲學基礎，以圖釐清荀學理論之基本結構。復就其理學之反省與評議，以審視其理論實踐之功能效益。終以古今諸學者對其之析評，以求重新對其學說做一客觀、公允之價值定位。

第一節 荀子的生平事蹟

荀子，名況，趙人。一稱荀卿，亦稱孫卿。〔註1〕有關其生平事蹟，可參

〔註1〕荀子姓氏之考證，歷有多議：《史記》之〈荀卿傳〉、〈春申君傳〉、〈李斯傳〉等，皆稱「荀卿」。《韓非子》、《戰國策》、《孫卿新書》、《韓詩外傳》、《鹽鐵論》、《漢書》等，則皆稱「孫卿」。而今，兩稱並世，同指荀子。然對之所以

考下列三份文獻之記載，以求其梗概。

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曾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世，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劉向，《孫卿新書·敘錄》：

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生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曾爲弟子，已而相秦。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善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

有二稱之起，則有三議：一謂避諱改稱，如司馬貞之《史記索隱》；一謂語音通轉，如謝墉之《荀子箋釋》；一謂性氏混一，如胡元儀之《鄒卿別傳考異》。其中以謝墉之議，似較合理。至於其稱「卿」一端，則世有三解：一說時人相尊而說爲卿，如《史記索隱》；一說荀子在齊三爲祭酒，視爲列大夫之長，故尊稱爲卿，如《鄒卿別傳考異》；一說蘭陵人善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故視卿爲荀子之字，如《孫卿新書》。

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

汪中，《荀卿子通論》：

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湣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唯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爲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答問。則自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爲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爲蘭陵令。本傳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則爲齊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爲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爲其屬邑，故以卿爲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爲令如此。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荀卿迫于亂世，鱗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子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并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子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爲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于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

凡此三文，皆未明述荀子游學齊前之事蹟，亦未明載荀子之生卒時年。然對後者，諸家學者多有其不同之議，茲列於后，以供參考：

謝扶雅，《中國政治思想史綱》：荀子生年爲公元前二九八年，卒年爲二三八年左右。

梁啓超，《荀卿之年代及行歷》：荀子生年假定爲公元前三〇七年，卒年爲二一三年，假定爲九十五歲。

陳元德，《中國古代哲學史》：荀子生於西晉紀元前三一零年左右，卒於西晉紀元前一三三年。

羅根澤，《荀卿游歷考》：荀子生年爲西元前三一六年，卒年爲二一三年。

蔣伯潛，《諸子通考上編》第六章：荀子生年為西元前三一三年，卒年在西元前二一九年後，享壽在九十五以上。

游國恩，《古史辨荀卿考》：荀子生年為西元前三一四年，卒年為二一七年，享年九十八歲。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荀子年五十游齊，約在西曆前二六五至二六〇年，二三〇年左右，死於蘭陵。

梁啟雄，《荀子行歷繫年表》：荀子生年假定為西元前三三六年，卒年為二一三年。假定為一百二十歲。

姜尙賢，《荀子思想體系》：荀子假定生於西元前三三六年，卒於西元前二三六年左右，享年約為百歲。

梁叔任，《荀子行歷繫年表》：荀子生年假定為三三六年左右，卒年為二一三年。

錢穆，《荀卿考》：荀子生年為西元前三四〇年，卒年為二四五年以前。

陳大齊，《荀子學說》：荀子大約是民國紀元前二十三世紀末葉至二十二世紀中葉或其稍後的人。

王忠林，《新譯荀子讀本》：荀子生年為西元前三一五年，卒年為西元前二二八年左右。

凡此諸議，莫衷一是。但總結而論，荀子生當戰國末季，暴秦漸統天下之時，當無異議。

復從汪中之考證以觀，荀子身歷趙、齊、楚、秦四國，亦當無可置疑。

至於荀子之身世，雖無從可考，但由其生平事蹟以視，可知其為戰國時代不為地籍所限，不受世祿所庇之新興知識階層中的一員。

蓋在戰國時代，教育普及，尙賢風盛，有識之士莫不投身仕途，一則以謀開展己身之前途；一則亦為期落實其治世之理想。荀子即曾經歷齊之稷下，三為祭酒；楚之蘭陵，二為縣令。終因仕途不順，退而著書傳經，老卒於蘭陵。

第二節 荀子的時代背景

荀子身處戰國末季之世，正值社會劇變的轉型之期。西周舊制已不復其傳統的控制效力，政治、經濟、教育等諸方面的變革，都帶動了社會的整體

變遷。使身處其間的知識份子，莫不反思社會亂象之源，以期止亂歸治，重安天下之勢。而荀子即是在此理性反省與批判的思潮下，構建其以社會思想為主體的學說理論。

茲就戰國時代之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的變革情形，以分述當時社會變遷之景況，以期廓清荀子為論之時代背景與其所受之影響，並冀提供一個瞭解荀子學說理論的客觀性參考架構。

一、尚賢政治之盛行

蓋尚賢政治之論，非起於戰國，而當遠溯西周初年封建之時，太公封齊，即已採行此議。見《呂氏春秋》：

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尚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註2〕

此中所透顯的即是，尚賢之議，重其實效；尚恩之議，重其道義。政治理念不同，所施行的政治措施亦各自有別。而就當時的政治局勢以觀，魯國重禮尚恩，然終不能競雄天下；齊國用法尚賢，則稱霸於春秋之初。二者雖皆與周制失控，王權旁落有關，但由其各別施政之成效，即可看出尚賢政治之發展與盛行，乃是時勢之必然歸趨。〔註3〕

復就政治制度之變革而論，封建廢而郡縣興，亦是為尚賢政治之得以盛行的關鍵契機。〔註4〕

蓋西周初年，定宗法，行封建，期以封建親戚，屏藩宗周；〔註5〕藉親緣之紐帶，以鞏固周室王權於不墜。〔註6〕故其封國與宗周之關係，在政治上即是「諸侯」與「天子」的縱向統屬關係；在宗族上則是「別子」與「元后」之橫向血親關係，並藉外婚制，以納異質諸侯於此宗法結構內，期成同質社

〔註2〕《呂氏春秋》（四部備要本），卷十一，長見，頁9上。

〔註3〕請參考黃俊傑著，《春秋戰國時代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臺北市：問學出版社，民國66年，頁164。

〔註4〕同註3書，頁80。

〔註5〕「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屏藩周。」——《左傳·僖二四》。

〔註6〕「封建的目的便在屏藩周室。封建的紐帶便是宗法的親親。」——徐復觀著，《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臺北市：學生書局，民國63年，頁27。

會之整合。〔註7〕西周即在此政治與宗族之雙軸規劃下，並輔以德刑之規範約制，而成就其封閉性社會型態之政治平治。

但事實證明，封閉性的社會型態仍不足以消弭人性之欲求，不足以對應人文之複雜。

故在西周末年，就其政治結構以觀，由於層層封建的分權結果，使天子之實權旁落，而僅具形式上的控制權勢。且天子又相率亂制，立庶繼統，〔註8〕損及宗法威信，益使諸侯得以犯上亂紀，而不以為非。再就社會變遷以觀，由於工商業之發達，使商業資本侵奪農民生計，促成土地私有之自由買賣，導致貧富懸殊。〔註9〕並間接影響諸侯國勢之強弱不一，而引發諸侯間之政經衝突。由是遂使封建瓦解，宗法失控，致成春秋戰國之亂世。

而在春秋戰國之時，國家型態漸形確立。〔註10〕為求政權統一，治權一體，故有郡縣之制起。〔註11〕轉「天子——諸侯」之親緣平等關係，為「國君——官吏」之法定從屬關係，是有官僚政制之勃興。相應於此的，即是形塑社會封閉型態的「親親」之策不復見效，逆轉而促發社會開放型態的「尚賢」之策的逐漸盛行。〔註12〕

蓋在西周時代，「尚賢」之策雖已見用，但囿於親緣關係之牽制，拔擢之人才多限於貴族子裔。〔註13〕及至春秋戰國之時，親緣解紐，諸侯、國君用人唯賢，視其德能以官施之，而不計較其出身。遂使社會菁英得展長才，激發知識階層之興起，打破社會階層之傳統制限，形成菁英循環之動態流動；鼓勵自由議論的開放風氣之實用導向，以期提供執政者富強競統的實效理據。故尚賢政治之盛行與知識階層之興起實有其密切之關係。〔註14〕

尚賢政治雖然開拓了知識份子的仕途，但由於官職有限，無法收納所有

〔註7〕同註6書，頁19。

〔註8〕如周宣王之立少子戲繼統；周幽王之立庶子伯服為太子，皆是天子破壞「宗法——封建」之“立嫡立長”的政治秩序之實例。請參見《史記·周本紀》。

〔註9〕請參考陶希聖著，《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臺北市：食貨出版社，民國66年，頁123~124。

〔註10〕請參考曾金聲著，《中國先秦政治制度史》，臺北市：啓業書局，民國58年，頁8。

〔註11〕同註10書，頁146。

〔註12〕同註3書，頁28。

〔註13〕同註3書，頁34。

〔註14〕請參考蕭璠著，《先秦史》，臺北市：長橋出版社，民國68年，頁134。

的知識份子，致使知識份子憑其才能遊歷諸國以求謀仕。而另一方面，由於知識份子對於「政治——社會」的理性自覺，致有一些不滿現狀的知識份子雖有議政求治之論，卻不願入仕為官。〔註15〕故在戰國時代，遂有養賢風起，以期收納知識份子，儲備官僚體系的可用之才。齊國更設稷下學宮，〔註16〕以廣納知識份子不任職而議論國事。直接的是提供知識份子一個保其安養，又可自由陳議的論政空間；間接的也是安撫了對「政治——社會」不滿的知識份子，緩和了知識階層與統治階層間的意識衝突。

而荀子一生中，在齊國稷下的經歷對其思想之型塑影響最鉅。故其為論，甚重人文建制之實，強調儒士致用之效，以期導正政治結構之理性化建制，規整政治功能之實效性運作，而落實其「人、禮、法」三者兼治的理想期許。

〔註17〕

二、商業經濟之興起

在西周封建制度中，各諸侯國皆成爲一個自給自足的獨立經濟單位。農業是爲當是時的主要經濟型態，不僅提供糧食之給，亦爲力役、兵源之基礎。

但在春秋戰國時代，由於工業的發達，使農礦產量大爲增加；土地私有的普遍化，使土地可供自由買賣；運輸條件的改善，使各地交通日趨便利而頻繁；貨幣的鑄造與流通，使經濟發展脫離實物交易的傳統型態，而轉爲財貨兼顧的契約交易。〔註18〕凡此諸種，皆刺激了商業的蓬勃發展，進而成爲該時代國勢強弱之現實指標。影響所及，使春秋戰國之君主莫不致力於求國富之策，以益國強。

商業的發展亦帶動了城市的興起，使城市成爲財富與人才匯聚之地。由於城市的生活，以「人——人」之關係爲主，遂使人文思想益形發達，從而

〔註15〕請參考余英時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民國69年，頁63。

〔註16〕齊國在威、宣王時代，國勢最爲強盛，並招聘天下學士講學於稷門之下。其中有儒家的孟子；有墨家的宋攄，尹文；有道家的彭蒙、田駢、慎到；有陰陽家的鄒衍；有法家的管子……。然諸子之學皆非獨尊一家之論，而係透過相激相蕩的相互薰染，漸趨融通之勢。荀子即是受此環境的感染，而能參酌諸論，以道爲衡，存菁去蕪，自成其學說之大觀。

〔註17〕請參考魏元珪著，《荀子哲學思想研究》，臺北市：東海大學出版社，民國72年，頁193~196。

〔註18〕同註14，頁115~132。

成爲春秋戰國時代「政治——社會」之理性反省與批判的主導理據，且由於政治之需求與商業之刺激，使現實、功利的實用思想抬頭，進而影響各國變法圖強的政經變革，使該時之「政治——社會」臨界於一舊制瓦解、新制漸興的劇烈轉變之際。〔註19〕

但由於商業經濟的重利導向，足以導致「政治——社會」的衝突不安；商業資本的左右民生，亦足以影響「政治——社會」的穩定平治。故在春秋戰國時代諸子言論之中，多有重農抑商之議，以圖干涉商業之發展，厚實農業之存續，欲冀安定國本，維持國紀。而執政之國君，亦不願見商賈勢力的擴大，危及其既有的權勢與利益，故亦欲將商業之發展納入其政府的管制之下，藉政治以規範經濟，使經濟所得的實利符合政治所期的實效。如是，既可確保其政經的控制效力，復可成就其富強的政經期許。是以在當是時的政治層面，最爲君王所見用，成效最顯著的即是力主中央集權、重農抑商的法家之論。〔註20〕

荀子身處其世，深明「經濟」對於「政治——社會」的影響至鉅，故其立論遂由「社會——經濟」之關係入手，強調人欲與實利的互動聯繫；進而轉至「經濟——政治」之關係，強調開源節流與禮法兼制的富強實效。因此，對荀子而言，「人——人」關係才是其立論的重心，「政治——社會」即是其爲論之主軸；而其有關經濟措施之議則是安定「政治——社會」之基本需求，調解「人——人」之利益衝突的實踐理據。

三、平民教育之普及

春秋戰國時代，由於政治的衝突，使原深受周制禮文薰陶，深習六藝之教的部份貴族子裔下降爲庶民，而以其知識之傳授作爲其謀生之工具，即世稱之“儒”者；並由於經濟之變遷，使原本無緣接受教育的庶民得因財富的寬裕而有餘力求學進仕，晉身知識階層，甚至謀得官職。故在春秋戰國時代，平民教育的普及，即爲其時政經變革下的必然趨勢。〔註21〕

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也帶動了對傳統禮文的反省與批判之理性思潮的論議風氣，是有諸子百家之說起，形成百家爭鳴之勢，而使春秋戰國時

〔註19〕同註14，頁136~139。

〔註20〕同註14，頁132。

〔註21〕同註14，頁133。

代成爲我國思想史上的黃金時期。且因此時之學術內涵，大致皆本周文傳統，而各有所據，別有所立，是以對春秋以前之思想有融舊鑄新之效，對秦漢以後之思想有開宗立範之功，故後世學者亦多稱此時爲我國學術發展的創造時期。〔註22〕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分此時之主要學派爲儒、墨、道德、名、法、陰陽等六家。而其中以儒家之源起最早，對於知識階層之興起影響最鉅，對於知識份子之性格的塑成關係最切，故在文化之傳承與發展上扮演著最具關鍵性的重要角色。〔註23〕

儒家所重者爲周文禮制的理念精義，以禮文爲形，以仁義爲質；形質相合，以立「內聖外王」之道，以成天下平治之統。故儒家始祖——孔子，其道一貫，其從周則採「因革損益」之方。因應勢異，求其理統，率民向道，端正時風，以期落實其平治天下之理想期許。

蓋周制禮本即係針對殷周之際的「政治——社會」之現實景況而立之人文建制，實含人文自覺與理性自省的憂患意識於其中。及至春秋戰國之時，「政治——社會」之現實景況較諸殷周之際猶爲複雜多變。復由於平民教育之普及，使社會菁英份子亦秉承此憂患意識之自警自勵，力圖構思重整「政治——社會」平治之策議，以期見用於君王，見效於時勢。而儒家即由是反思傳統，融合智德，將「政治——社會」之關係溯源於「人——人」之關係，期冀從根源處治起，以調濟「人——人」之和諧互動，進而規整「政治——社會」之整合平治。

除儒家而外，法、墨、道、陰陽、名等諸家之論，亦皆就「政治——社會」之角度設言。法家重明法尚刑以論治；墨家重兼愛非攻以論治；道家重虛靜無爲以論治；陰陽家重五德終始以論治；名家重名實定指以論治。

自西周以迄春秋戰國，是爲學術思想由合而分的轉型時期；自春秋戰國以迄秦漢，是爲學術思想由分而合的定型時期。故在戰國末年，學術發展漸趨合流，而政治發展也漸歸一統。荀子即身處其時，以儒學爲宗，以諸學爲輔，應解時蔽，歸諸正道，形構其一家之言，以期凸顯其禮義之統，以謀落實其正理之治。

〔註22〕請參考蕭公權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上）》，臺北市：文化大學出版社，民69年，頁3~4。

〔註23〕同註15，頁36~40。